

January 2023

## How Did Philologists Influence the New Literature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 A Discussion on Qian Xuantong's View of Vernacular Writing

Xiaohui Wa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

### Recommended Citation

Wang, Xiaohui. 2023. "How Did Philologists Influence the New Literature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 A Discussion on Qian Xuantong's View of Vernacular Writing."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42, (6): pp.133-144.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42/iss6/15>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

## How Did Philologists Influence the New Literature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 A Discussion on Qian Xuantong's View of Vernacular Writing

# “声韵训诂学大家”如何介入“五四”新文学

## ——论钱玄同的白话文章观

王小惠

---

**摘要:**钱玄同以声韵训诂学大家的身份加入新文学后,从文字音韵学中博搜例证为“文章即说话”提供了理据,确立了“音本位”的白话文章观。并且他提倡多采用复音词、虚词,以及全用西式标点,以实现“口说的白话”与“笔写的白话”在表意、语气上的“言文一致”。同时,他通过选择白话文学的对手、建构白话文学史、确立白话文的适用范围,破除了“五四”白话文学的历史困境。钱玄同的白话文章观较沉重地打击了文言文及以它为根柢的中国传统文章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其独特的价值。

**关键词:**白话; 文章; 言文一致; 困境

**作者简介:**王小惠,文学博士,西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章太炎及其弟子与“五四”新文学运动关系研究。通讯地址:重庆市北碚区西南大学文学院,400715。电子邮箱:xiaoyanjing1985@163.com。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章门弟子’与五四新文学运动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1BZW127]的阶段性成果。

---

**Title:** How Did Philologists Influence the New Literature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 Discussion on Qian Xuantong's View of Vernacular Writing

**Abstract:** After participa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iterature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philologist Qian Xuantong provided evidence for the “unity of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s” from philological perspectives, establishing the view of vernacular writing centering on “voice”. He also advocated the use of polysyllabic words, function words and Western punctu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 in expressing meaning and presenting mood. At the same time, he broke the historical dilemma of the May Fourth vernacular literature by choosing vernacular's opponent, constructing the history of vernacular literature, and establishing vernacular's scope of application. Qian Xuantong's view of vernacular writing has unique value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Keywords:** vernacular; literary composition; unity of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s; dilemma

**Author:** Wang Xiaohui, Ph. D.,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 includ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ang Taiyan, his disciples and the May Fourth literary revolution. Address: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Beibei District, Chongqing 400715, China. Email: xiaoyanjing1985@163.com This article is supported by the General Project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Fund (21BZW127).

---

有学者感叹,当今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没有一部是沿着语言发展的线索而写作的”,不仅如此,“无论是轰轰烈烈的关于汉语汉字的各种讨论,还是作家各自的语言实践和语言风格,都只是在文学史中作为点缀出现”(文贵良 26)。因

“语言”未成为文学史写作的线索与关键词,钱玄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位置较为“尴尬”。在目前的文学史叙述中,他或是《新青年》杂志“双簧信事件”的策划者,或是成为陈独秀、胡适等人新文学主张的追随者。这些叙述,弱化了钱玄同

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作用。陈独秀称赞,钱玄同作为“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新文学,“何忧全国之不景从也”(《致钱玄同》13)。钱玄同精研音韵训诂之学,以“文章即说话”为核心来建构新文学,其视角与方法在“五四”时较为独特。按其自述,他讲的“文章革命”,与胡适之、周启明、刘半农、陈独秀诸公的新文学设计“观念完全不同”(《写白话与用国音》649)。<sup>①</sup>

## 一、“文章即说话”及其理据

在传统的文言文逻辑中,文字一经产生,就发作用于语言,形成了“音随字变”的语言规则。这种以文字为基础的文章观,使“语言”成为“文字”的附庸。即便清末的白话文运动,也是“用古文想出之后,又翻作白话写出来的”(周作人 95),延续的仍是“文字规约语言”之思维。“五四”时,钱玄同彻底颠覆传统语言逻辑中的主从关系,大胆提出“音本位”的思路:“文字本来是语言的记号,嘴里说这个声音,手下写的就是表这个声音的记号,断没有手下写的记号,和嘴里说的声音不相同的。”(《〈尝试集〉序》;《钱玄同文集》第1卷 85)在他看来,“文字”是表音的记号,为辅助性的工具,那么“说话”(声音)才是文章写作的根柢与前提,而文章写作的重点与本色应去靠近、迁就“说话”(声音)。这将“说话”与“文章”置于同一性关系中,“文章”的优劣在于是否呈现出“说话”的“真”。“五四”初期,陈独秀、胡适等人虽也倡导“文章即说话”,可“没有高深的道理”(周作人 96),只是一句空话而已。直到钱玄同从文字音韵学中博搜例证以大畅其旨,才让以“言”为本质的文章观得以立足。

钱玄同选择从古人“造字”的角度思考“字随音变”的问题,认为:

古人造字的时候,语言和文字,必定完全一致。[……]拿“六书”里的“转注”来一看,很可以证明这个道理:像那表年高的意义和话,这边叫做 lau,就造个“老”字;那边叫做 Khau,便又造个“考”字。同是一个意义,声音小小不同,便造了两个字,可见语言和文字必定一致。因为那边既叫做 Khau,假如仍写

“老”字,便显不出他的音读和 lau 不同,所以必须别造“考”字。(《〈尝试集〉序》;《钱玄同文集》第1卷 85)

从“老”“考”等“因声造字”之例子,可知文字不过是表音的工具,语音不同,文字自然各异,也即是钱玄同所说的“若是嘴里声音变了,那就手下记号也必须跟着他变的”(《〈尝试集〉序》;《钱玄同文集》第1卷 86)。

不仅在“造字”时是“以文字合之语言”,钱玄同还以文字学上的实例证明汉字中虚字实字的“字形”变迁也遵守“跟着字音转变”(《〈尝试集〉序》;《钱玄同文集》第1卷 86)的规律:一是可从《说文》里的“形声”字来看,“正篆和或体所从的‘声’,尽有不在一个韵部里的;汉晋以后的楷书字,尽有将《说文》里所有的字改变他所从的‘声’的;又有《说文》里虽有‘本字’,而后人因为音读变古,不得不借用别的同音字的”,这些皆是“今音与古不同而字形跟了改变的证据”(86);二是能从文言与白话的变迁史中窥出,譬如“‘矣’字音变为 li,就别造‘哩’字;夫(读为扶)字在句末——表商度——音变为 bo,就别造‘啵’字,再变为 ba,就再借用‘罢’字(夫的古音本读 buo);‘无’字在句末——表问——音变为 mo,就借用‘么’字,再变为 ma,就再别造‘吗’字。(无的古音本读 mu)这更可见字形一定跟着字音转变”(86)。钱玄同建构的“字”随“音”变之逻辑,使“言语”取代了“文字”在传统中国文化中的中心地位,让“文章即说话”理念具有了语言学上的事实依据,而非空洞的口号。

从语言学意义上阐释“文章即说话”的合理性后,钱玄同又从汉文章发展史上搜寻到极具说服力的例证,表明先秦以来的文章“大都是用白话”(《〈尝试集〉序》;《钱玄同文集》第1卷 87—88):首先,《盘庚》《大诰》“后世读了虽然觉得佶屈聱牙,异常古奥”,可这些文章“实在是当时的白话告示”(88);其次,《尧典》中的“都”“吁”等字和现今白话文所用的“阿呀”“呒”“唉”等并无分别,而“《公羊》用齐言,《楚辞》用楚语”与“现在的小说里搀入苏州、上海、广东、北京的方言”也没有什么分别(88);再次,李耳、孔丘、墨翟、庄周、荀况、孟轲、韩非等人的著作“文笔无一相同,都是各人做自己的文章,绝不摹拟别人”(88)。

以上例子,通过《盘庚》《大诰》《公羊》《楚辞》等传统学术经典或文学作品,辅以李耳、孔丘、庄周、孟轲等传统名家的著作,来表明古书中的雅言只是当时的“今语”。这提高了白话的地位与历史说服力,使“文章即说话”成为自然而来的正统的语言发展规律。

同时,钱玄同用大量的例子说明,先秦以来的古人为了避免“言文分离”,在撰文时“所用的白话,若是古今有异,那就一定用今语,决不硬嵌古字,强摹古调”(《〈尝试集〉序》;《钱玄同文集》第1卷88):比如,“《孟子》里说的,‘洚水者洪水也’,‘泄泄犹沓沓也’,这是因为古今语言不同,古人叫‘洚水’和‘泄泄’,孟轲的时候叫‘洪水’和‘沓沓’,所以孟轲自己行文,必用‘洪水’和‘沓沓’,到了引用古书,虽未便直改原文,然而必须用当时的语言去说明古语”(88);又如,司马迁的《史记》采用《尚书》时,“一定要改去原来的古语,做汉人通用的文章”,使之“不能和当时的白话相差太远”(88)。以上例子传递出“言文一致”的另一标准:文章写作不仅要“今人用今语”,而且当遇到“古今有异”时,也只可舍“古”而留“今”,以真正实现不同时代的人用各自时代的“话”。

钱玄同从汉文章发展史的角度梳理出,“文章”(书面语)与“说话”(口语)自先秦以来都是一致的,可这种正常的文章规律在西汉时较为衰微,特别从西汉末年年开始被逐步打破。他解释道:首先,西汉末年的扬雄,刻意摹拟古人,其辞赋浮伪雕琢,“东汉一代”受其影响,“到了建安七子,连写封信都要装模作样,安上许多浮词”(《〈尝试集〉序》;《钱玄同文集》第1卷89);而后的六朝骈文更是“满纸堆垛词藻,毫无真实的情感”,只要“打开《文选》一看,这种拙劣恶滥的文章,触目皆是”(89);唐朝以来的韩愈、柳宗元纠正了“《文选》派”的弊害,“所做的文章,却很有近于语言之自然的”,如果继起的人能明白“韩柳矫弊的宗旨”,便可逐步“回到白话路上来”。可宋朝的欧阳修等人“名为学韩学柳,却不知道学韩柳的矫弊,但会学韩柳的句调间架,无论什么文章,那‘起承转合’,都有一定的部位”,此种“可笑的文章”与那“《文选》派”相比,真如“半斤和八两的比例”(89);明清时期的归有光、曾国藩等人更是“拼命做韩柳欧苏那些人的死奴隶”,立了“桐城派”的名目,将“文章即说话”的写作规则“搅得昏

天黑地”(89)。

在钱玄同的论述中,从扬雄开启的“言文歧异”之路,中断了以“音”为中心的语言逻辑,让文章沦为堆砌各种陈套语、表象词的“泥美人”(《论世界语与文学》;《钱玄同文集》第1卷20),破坏了语言文字发展的自然规律,是历史的“逆流”。这种“逆流”在“五四”时依然很有势力,导致了荒谬的语言现象:譬如行鞠躬或点头礼时,还说“顿首”“再拜”(《随想录 四五》;《钱玄同文集》第2卷20);又如脱下西洋式的帽子,却说“免冠”(20);再如“在改阳历以后写‘夏正’,称现在的欧美诸国为‘大秦’者”(20)。以此例推,“则吃煎炒蒸烩的菜,该说‘茹毛饮血’;穿绸缎呢布的衣,该说‘衣其羽皮’,住高楼大厅,该说‘穴居野处’;买地营葬死人,该说‘委之于壑’”(20)。这种荒谬,投射出言文截然分离的危害性——使语言变得造作矫揉,脱离实际。

所以“五四”新文学的使命就在于,恢复被中断的以“音”为中心的语言发展规律,即:“今人要用今语做文章,不要用古语做文章”,而且“古人做的很自然的白话文章,也不当学”,因为“在他当时是今语,该这样做”,而“在我们现在已经变为古语,不该照样去学他”(《关于新文学的三件要事》;《钱玄同文集》第1卷356)。为此,钱玄同还制定了“文章即说话”在应用时的具体规则:一是“只可拿现在的声音来做标准”,“例如某本字,在文言里现读甲音,白话里应该用这个本字的地方也读甲音,这类本字,自然应该采用;又如某本字在文言里虽读甲音,而白话里应该用这个本字的地方,却读了乙音,那就只可写一个和乙音相同的假借字了”(《新文学与新字典》;《钱玄同文集》第1卷105);二是“道古时事,自当从古称,若道现代事,必当从今称”,比如“冠”“履”“袷”“笏”“豆”“尊”等古称只可用于“道古”,若道今事,这些必当改成“帽”“鞋”“领”“袴”“盃”“壶”等名,“断不宜效法‘不敢题糕’之迂谬见解”(《反对用典及其他》;《钱玄同文集》第1卷6)。

此种语音中心主义的逻辑在“五四”时期就备受质疑。按中国传统的文字常识来讲,中国汉字是主形的,虽与言语(声音)有关,但并非一体。这也是“五四”反对者批判语音中心论的理念支撑。而钱玄同釜底抽薪地提出中国汉字多是主音不主形。在他看来,汉字构造上有“象形”“指事”

“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大阶段,从这“六书发生的次序”来看,汉字是从“象形”到“表意”,再由“表意”至“表音”,等到“纯粹表音的假借方法”发生时,这便离拼音“只差一间了”(《汉字革命》;《钱玄同文集》第3卷68)。并且“离形表音”的“假借字”从殷商以来便已开启发展的历史:假借字在殷代的甲骨文字中已出现,例如借“唐”为“汤”,借“夙”为“风”,借“果”为“嫫”等(69);而后到春秋战国儒学作品如《诗经》《尚书》《春秋》里的假借字又多了,这几部书历史久远,且因传写人不同,“所以彼此异文甚多,这些异文,什九都是假借字”(69);再到汉代的《史记》《汉书》等“触目都是假借字”,而后的唐宋元仍流行假借字的风气(69);至今此风仍未断绝,比如“北京的书店掌柜写书签子,‘《汉书》’作‘《汗书》’”(70)。钱玄同通过对汉字构造的历史考察,极端地从学理上表明“文章即说话”符合于汉字“离形就音”之趋势。

综上,钱玄同发挥自己文字音韵学家的优势,验证出“文章即说话”在历史上已有很坚固的基础。这一理念不仅是语言问题,更是权力问题:一方面表明“五四”白话运动并非莽撞的新设计,而是去恢复被文言文中断的言文一致的语言发展规律,使“言语”在现代中国取代“文字”的主流地位,颠覆“言语以就文字”的文言书写传统;另一方面展示出“文章人人会做”的“五四”平民精神,“打通‘说’、‘写’、‘读’之间的阻隔,解构传统文章义法及其至尊地位,也有助于新思潮的传播与接受”(王本朝 148)。

## 二、“说话”如何入“文章”?

钱玄同的“文章即说话”,要求文章“老老实实照着说话写了”(《文学革新杂谈》;《钱玄同文集》第1卷159)。可“笔写的白话”无法全然等同于“口说的白话”(朱我农 174)。章太炎就认为,白话文不能“尽传口语的真相”(《国学概论》22)。为此,钱玄同又从语言文字学上进行了相应的思考,以使白话文章能传出口语之“真相”。

(一)多用复音词、虚词,实现表意上的“言文一致”。“中国语言为文字形体所牵制”,口头上的白话多是复音词,“大半是用两个或两个以上音节来表示一个意义”,并借助介词、连词等虚

词展示言语间的逻辑;而书面上的文言为使文章凝练、齐整,少用或不用虚字,多是“一音一字,一字一形”(乐嗣炳编 6)。因此,钱玄同认为,要使“说话”真正入文,需完全接受“说话”中的复音词、虚词,让“口说的白话”与“笔写的白话”在表意上得以统一。“白话”入文时,用字用语比“文言”繁多。当时一些白话反对者深揪于此,认为白话文章字句冗长,语言啰唆。钱玄同则反其道而行之,举出大量语言实例,论证文言文的“简”是“文法的不完整”之表现,譬如:

《史记·殷本纪》的《赞》末了一句,叫做“孔子以殷辂为善而色尚白”。殷朝的车叫做辂,是一件事;孔子以辂车为善,又是一件事;殷朝色尚白,又是一件事;三件事绝不相干,忽然用一个“而”字,把他连成一句,这真是不通到极点了。[……]要知二千年前的大学问家司马迁竟会闹这笑话的缘故,就坏在一个“简”字上。只因简了,于是就做出这样笼统、粗疏、含糊的句子来了。(《文学革新杂谈》;《钱玄同文集》第1卷158)

在钱玄同的逻辑中,文言的“简”,看似耐人寻思、饶有趣味,却让语脉与意脉分离,破坏了日常的习惯语法,最后成了笼统的“糊涂账”。他提出清晰、精密、朗畅的文章,其字数一定是多的:例如一个单音的“道”字,容易使人误解,“若用复音语,曰‘道路’,曰‘道理’,则一望便明白了”(《文学革新杂谈》;《钱玄同文集》第1卷158);再如“‘每星期的评论’,这六个字何等明了。‘星期’是嘴里常常说的,又是一个复音名词。‘周’是嘴里所不说的(这名词是从日本贩来的;其实日本称为‘周间’,也是复音名词。)又是一个单音名词。自然是‘星期’比‘周’要适用了。‘每星期’之下加一个‘的’字,文法便很完备了”(《通信:同音字之当改与白话文之经济》645)。这二例表明使用名词、动词之类时,“复音”比“单音”的意思明显一些,更有助于文意的实现。

“名词动词改用复音”(《文学革新杂谈》;《钱玄同文集》第1卷158),可使“文章”传达“说话”的意义时准确明显,能清晰地展示事物的性

质、状态、范围、程度。在使用复音词的同时，“文章即说话”在表意上的实现，也需借助虚词来连接不同的词组、短语以及分句，将“说话”中的各种情感关系、逻辑语义完整呈现。在钱玄同看来，虚词有分清语言结构层次与避免语意歧义的作用，而文言文为求“简”，时常省略虚字，这极易闹笑话：

从前听见人家讲笑话，说有一付对联，叫做“今年真好晦气全无财帛进门”，有两种读法：(1)“今年真好晦气，全无财帛进门。”(2)“今年真好；晦气全无；财帛进门。”又听说有两句话，叫做“雨落天留客天留人不留”，也有两种读法：(1)“雨落天留客，天留人不留。”(2)“雨落天，留客天，‘留人不’？‘留’！”[……]从这种笑话里，就可以看出中国文法的含糊，“虚字”的缺少。（《通信：同音字之当改与白话文之经济》648）

钱玄同从此笑话，揭示了文言文因虚字缺少而导致的文意含糊现象。在他看来，虚词的缺乏，会削弱语言的逻辑性，使语言单位间的相互关系不能被明晰地表现出来，故而“五四”白话文写作时“介词连词之类应该有的，一个也缺少不得”（《文学革新杂谈》；《钱玄同文集》第1卷158），并应“规定一种极周密极完备的语法”，纠正文言文“任意省略，任意颠倒，任意变换”介词连词之类的“用‘虚字’的杂乱无章”，并“把含糊的弄他清晰，缺少的一一补足”（《通信：同音字之当改与白话文之经济》646—648）。只有这样，白话文才能“张口见喉咙，一切说尽，毫无含蓄”（钱玄同，《文学革新杂谈》；《钱玄同文集》第1卷160），防止“文失其实”，让读者明白文意。

可名词、动词采用复音，并加入介词、连词等虚词后，文章的字数比旧日古文“必至成五比三的比例”，甚至“加了一倍”，故而“一般人觉得本来只要写三百字就完事的，现在要写到五百个字才算完事，于是就说：‘这是不经济’”（钱玄同，《文学革新杂谈》；《钱玄同文集》第1卷158）。为此，钱玄同从文章的写作与接受两方面进行辩

护：从读者角度来讲，假定看二十个字需要一分钟，因古文“笼统、粗疏、含糊”，十五分钟看完三百字的古文后，“还要仔细推求，才能明白”，需“费上两三个十五分钟”，但“若看白话的文章，因为文章分晰、精密、朗畅，所以五百个字虽然要看到二十五分钟，可是看完了，意思也明白了，用不着再瞎费仔细推求的工夫”（158—159）；另从作者一面来看，尽管多写了二百个字，看似多费一些时间，可是“写的人的意思，老老实实照着说话写了，不必去用那什么‘推敲’的工夫，比那少写二百个字的反可以少耗时间”（159）。可见，白话文不用读者“推求”，亦不需作者“推敲”，所耗费的时间实际上比古文反而是“经济的”。

同时，钱玄同依据汉语语法进化的规律，论证使用复音词、虚词乃是文章历史进化之表现。在他看来，“书愈古，文法愈疏漏，不但介词、连词常常省略，而且句子也不大完备”（《国文的进化》；《钱玄同文集》第3卷108）；例如“《尚书》的《甘誓》，起首曰：‘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谁与谁战，哪一方面召六卿，王是哪一朝称的某王，都没有说明”（108）；又如“《左传》首句曰：‘惠公元妃孟子’，连写三个名词，就可算作一句。若是现在的小学生做出这种文章来，教员一定批他不通”（108）。由于欠缺复音词、虚词，夏、商、周“三代”留存下来的高文典册存有此种“不通的文句”；汉唐以来，文章渐进化，不再忽略复音词与虚词，故而用字用句完备精确得多；后来明清的施耐庵、曹霁、吴敬梓诸人用白话创作，比之前更是大大地进化了；而“五四”以来的白话小说、戏剧、诗歌的用字造句“比施、曹诸人又精密得多”（108）。这里的“文章逐渐进化”（108）之线索，实则就是复音词、虚词从少到多进入“文章”的历史脉络，意味着复音词与虚词的多寡直接决定着文章的进化程度。

在钱玄同的论证下，复音词、虚词大量入文是语言进化之体现，能改变文言文难懂、朦胧的句法关系，使句意的逻辑关系更加严密，让“说话”中具体的态度、感受、思想、情感得以完整传达，实现表意上的“言文一致”。此种文章观，对“五四”新文学影响深远，使其摆脱了古文的诗性传统，走向表意明白、求真通俗的写实之路。

（二）全用西式标点，实现语气上的“言文一致”。“说话”入文时，其外在的语气如何在具体

文章中进行精准的展示?语气语调是“说话”里极为重要的部分,可声音的大小起伏、轻重缓急很难真正进入书面语的字里行间。朱我农就以此质疑“五四”白话文道:“口说时有声调状态帮助表明人的意思,笔写时就没有此等辅助品了”,比如“你不要瞎说”一句话,“在口说时或作笑容,或作怒态,或作和声,或作激调语,意随声调状态级级不同”,倘若写在纸上,就算加上什么“拍案怒道”“低声道”“微笑道”等语,仍是“不能形容尽致的”(朱我农 174—175)。

为此,钱玄同提出全面引入西式标点,想用其来帮助“语气”的呈现,使“说话”中的种种声调状态进入书面语,让文章成为“有声”的“活语言”,以符合“口语”之“真相”。在他看来,“文字里的符号是最不可少的,在小说和戏剧里,符号之用尤大;有些地方,用了符号,很能传神;改为文字,便索然寡味”(《刘半农译〈天明〉的附志》;《钱玄同文集》第1卷 82),以刘半农翻译的《天明》为例:

本篇中“什么东西?”如改为“汝试观之此何物耶”;“迪克?”如改为“汝殆迪克乎”;“我说不相干!”如改为“以予思之实与汝无涉。”又像“好——好——好一个丈夫!”如不用“——”“!”符号,则必于句下加注曰:“医生言时甚愤,用力跌宕而去之”;“先生!他是我的丈夫!”如不用“!”符号,则必于句下加注曰:“言时声音凄惨,令人不忍卒听”,——或再加一恶滥套语曰:“如三更鹃泣,巫峡猿啼”,——如其这样做法,岂非全失说话的神气吗?(《刘半农译〈天明〉的附志》;《钱玄同文集》第1卷 82)

以上例子表明,问号、破折号、感叹号等标点能留存“说话”中的语气、情感、气势、神韵,使作品中人物说的话不再是作者刻意模仿作品里人物所说的话,而是作品人物自身的真实声音。这提升了作品在语气上的真实感,亦使读者在阅读时犹如与书中人面语。而中国传统文言文,句式简短,不曾注意到标点符号的作用,只讲究字字匀整,并于每字之旁施以圈点。钱玄同认为这让文章变得模糊晦涩,比如:

《孟子》:“季孙曰异哉子叔疑。”这一句有两种解法。

(1)季孙曰:“异哉!”子叔疑。(赵岐说)

(2)季孙曰:“异哉!子叔疑。”(朱熹说)

《左传》:“遂置姜氏于城颍。”这一句也有两种解法。

(1)遂置姜氏于城颍。(杜预说)

(2)遂置姜氏于城,颍。(金人瑞说)(《〈新青年〉改用左行横式的提议》;《钱玄同文集》第1卷 36—37)

可其中“朱熹和金人瑞的解说都是错的”,“假使当日孟轲、左丘明做书的时候有了符号,自己记得明明白白,那么朱熹、金人瑞也不至于随便乱解了”(《〈新青年〉改用左行横式的提议》;《钱玄同文集》第1卷 37)。钱玄同的辩解,有一定道理。中国文言文拒绝标点,故“只有平铺直叙的写,只有依照顺序的写”,以至于“平易者流为浅俗,奇险者成为艰涩”(郭绍虞 96—97)。这所导致的“艰涩”,很容易沦为钱玄同所批评的模糊不清之状态。

故而钱玄同认为,传统文言文要想重获生命力,需加入标点。他以省略号的使用举例道:例一,“《史记·高祖本纪》:‘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在两个‘便’字的中间,用‘……’号表说话停顿,‘家’字底下再用‘……’号表语意未完,便活跳画出一个正要皇帝时候的汉高祖来了”,这也展示出“汉高祖那时看见诸侯将相做出一种‘天命攸归奏请登极’的样子来,请他做皇帝,心里虽然快活得很,面上觉得有些不好意思答应出来,于是胀红了脸,说出这样一句不爽快不完全的话来”(《〈新青年〉改用左行横式的提议》;《钱玄同文集》第1卷 36);例二,“《史记·张丞相列传》:‘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这都应该用‘……’号去表他口吃的神情”(36)。以上二例中的省略号有“显精神”之效,捕捉到了人物心理的细微变化,让汉高祖等形象有了历史的温度。

钱玄同主张文章全改西式标点的思路,比较大胆。当时一些“五四”主将对此有所犹豫,认为汉语的语气词较多,可取代相应的西式标点。胡适认为:“疑问之号,非吾国文所急需也。吾国文凡疑问之语,皆有特别助字以别之。故凡‘何,安,乌,孰,岂,焉,乎,欤,哉’诸字,皆即吾国之疑问符号也。故问号可有可无也。”(《论句读及文字符号》;《胡适文集》第9卷 683)刘半农也指出:“至于符号,则‘?’一种,似可不用。以吾国文言中有‘欤哉乎耶’等,白话中有‘么呢’等问语助词,无须借助于记号也。”(刘半农 12)钱玄同则认为中国文章里的部分语气词可以表达多种语气,例如:

“乎”“哉”这类字,疑问也用他,嗟叹也用他。像“人焉廋哉”的“哉”字是“?”;“恶用是颀颀者为哉”的“哉”字是“!”;“其然岂其然乎”的“乎”字是“?”,“使乎使乎”的“乎”字是“!”。诸如此类,倘使不加符号,实在不能明白。(《〈新青年〉改用左行横式的提议》;《钱玄同文集》第1卷 35)

在胡适、刘半农看来,汉语语气词“安”“乎”“欤”“哉”等就是疑问助词,如果在文中再用疑问号就会显得啰唆重复。钱玄同通过以上语言学实例,表明中国传统汉语中的“乎”“哉”等词所表示的语气时常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它们既有当疑问词的情况,也表感叹的语气。这表明中国语气词无法与西方标点符号完全等同。另外,胡适主张以“△”代“;”,以“、”代“:”(《论句读及文字符号》;《胡适文集》第9卷 681—682)。钱玄同却认为,胡适的办法“若自己圈点古书,原无不可”,可从现代排版上看,排印新书杂志时“△”“、”等号“皆为铅模所无”,所以“与其定铸,不如全用西号了”(《句读符号》;《钱玄同文集》第1卷 113)。

钱玄同从中国传统语气词的特殊性与现代书籍排版的角度表明,“五四”白话文章需要全面使用西式标点。他在《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2号上发表《句读符号》,将标点符号进行了相应的介绍,并通过“五四”同人们的各种主张进行去

取,拟定了繁简两种标点规则:

(甲)繁式 用西文六种符号——,(读);(长读):(冒或结).或。(句)!(叹)

(乙)简式 仍照以前用句读两号——、(读)。(句)(《句读符号》;《钱玄同文集》第1卷 112)

此后,钱玄同与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想法渐趋一致。《新青年》杂志1919年第7卷第1号就附有《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对西式标点进行系统的说明与要求。在此前,《新青年》的作者就已有意识地使用西式标点,譬如鲁迅1919年4月28日完成小说《药》,就叮嘱负责《新青年》编务工作的钱玄同去鉴定、改正小说中的“那些外国圈点之类”(《致钱玄同》;《鲁迅全集》第11卷 376)。钱玄同1919年11月与周作人、胡适等人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修正案)》,这不久得到教育部的通过,并且此议案作为教育部1920年2月训令第53号被公布。而后,西式标点正式地进入“五四”白话文之中,随后逐步定型,成为新文学的文法之一。这些标点的进入,拉近了新文学与“说话之真相”的距离,使得“五四”白话文在语气的上渐趋言文一致。正如朱自清所讲,“白话文之所以为白话文,标点符号是主要的成分之一。标点符号表明词句的性质,帮助达意的明确和表情的恰切”(朱自清 258)。

### 三、“五四”白话文学的困境与钱玄同的突围

“五四”白话文学建立在“文章即说话”理念的基础上,尽力采用复音词、虚词、西式标点,期盼作文实现“说话”时那种明白自然之境界。但这种理念施行时遭遇诸多困境。钱玄同又凭借语言学家的优势,进行了突围。

(一)选择“五四”白话文学的“敌手”。“五四”时期,陈独秀等人虽以“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再答胡适之》;《陈独秀文集》第1卷 236)的激烈态度在新文学中推行“文章即说话”理念,可他们在处理文言、白话文学的关系

时,界限较为模糊,没有着力点。这让新文学陷入“自鸣得意”而无“敌手”的困境中,犹如挥拳于空中。

钱玄同加入新文学阵营后,借助其师章太炎文字训诂之学在1917年前后鼎盛于世的契机,将新文学攻击的目标集中于“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赞文艺改良附论中国文学之分期》;《钱玄同文集》第1卷1)。章太炎认为,作文应“先求训诂”(《讲文学》;《章太炎全集·演讲集》45),而后才可遣词造句,以避免空洞华辞。这对作者的文字学功底要求极高,故而他鄙视欠缺文字训诂基础而擅长文辞的“桐城”与“文选”,讽刺桐城文风“笑若龇齿,行若曲肩,自以为妍,而只益其丑”(《与人论文书》;《章太炎全集·书信集》384);同时也不满“文以耦丽为主”(《文学总略》;《章太炎全集·国故论衡》49)的文选派,强调骈偶声韵藻采并非文章构成的决定元素。钱玄同虽未认同章太炎“先求训诂”的文章立场,却将其师所鄙视的“文选”“桐城”视为“弄坏白话文章的文妖”,讽刺《文选》派搬运“垃圾的典故”与“肉麻的词藻”,而桐城派是“拼命做韩柳欧苏那些人的死奴隶”,卖弄“可笑的义法”(《〈尝试集〉序》;《钱玄同文集》第1卷89—90)。

不仅借助其师的理论资源,<sup>②</sup>钱玄同还从语言文字进化规律,对二派进行否定。在他看来,能承载思想学术的语言文字皆是“庞杂不纯的”,那“纯而不杂”的语言文字只会出现在文化初开、思想简单的时候,因为“到了彼此一有交通,则语言即有混合;学日渐发达,则字义日有引申;一义转注为数语,一语假借为数义,那就要庞杂不纯了。愈混合,则愈庞杂,则意义愈多;意义愈多,则应用之范围愈广;这种语言文字,就愈有价值了”(《新文体》;《钱玄同文集》第1卷299—300)。而桐城派“文章的格局有一定,用字的范围有一定,篇幅的长短有一定,句法的排列有一定”,最后只有“削足适履”的方法,“改事实以就文章”(300)。《文选》派能作的骈文也是“敷衍故实,泛填词藻”,“外貌虽极炳烺,而叩其实质,固空无所有”(《反对用典及其他》;《钱玄同文集》第1卷9)。这二派或寄生般地追附古人,或让作为点缀的文辞成为目的,皆违背了语言越进化越庞杂的规律,使文章作来作去,仍在“旧圈子”里转。钱玄同以实例讽刺道:

有人讲笑话道:“一个塾师替人家做祭文,抄错了一篇成文。人家来质问。塾师大怒,说,我的文章是有所本的,决无错理,除非他们家里死错了人。”桐城派的做古文,正是如此,他所以要如此者,就是要纯不要杂的缘故。(《新文体》;《钱玄同文集》第1卷300)

由此可窥出“要纯不要杂”的危害性,使语言束缚于骈偶对仗、义法辞章的藩篱中,而丧失其活力与灵性。所以钱玄同指出,“桐城派”“《选》学家”是“有害文学之毒菌”,其烈于“八股试帖”与“淫书秽画”,因为“八股试帖”只是骗“状元”“翰林”的敲门砖而并非真学问,“淫书秽画”更是不正当的玩意儿,这二者如“中毒”,较易消除;可是“桐城”“选学”则“无论何人,无不视为正当之文章,后者流毒已千余年,前者亦数百年”(《文字改革及宗教信仰》;《钱玄同文集》第1卷190)。

钱玄同对二派的攻击,使“五四”白话文批判传统文言文时有了切实的论据,而“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也成了当时标语式的革命口号,具有极强的号召力与鼓动性。钱玄同等人策划的“双簧信事件”,更是将“桐城”与“选学”视为攻击的靶子,并将这个“靶子”具体外化到林纾等人的身上。由此,新文学才有了切实的敌手,引发了林纾等人对“五四”白话文的关注与批判,破除了挥拳于空中的困境。

(二) 建构白话文学史理念。“五四”初期,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等作简单地将中国传统文学浓缩成一个整体来进行否定。这斩断了“五四”白话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的联系,使其缺乏历史根基。钱玄同较早意识到,没有历史积淀与基础的文学,犹如无源之水、无根之花。他加入新文学团体后,立即对“五四”白话文学进行历史溯源。

钱玄同1917年已有构筑白话文学发展脉络的想法,将胡适的白话诗与“杜、白之诗”“周、辛之词”“关、马之曲”“施、曹之小说”等纳入“古人用古语,今人用今语”(《论世界语与文学》;《钱玄同文集》第1卷19)的“言文合一”线索之中。这一想法在1920年的《〈儒林外史〉新叙》中进一步展开,呈现出白话文学演变的基本面貌:“中国白

话文学的动机,起于中唐以后”,譬如白居易等人就写过一些白话诗(《钱玄同文集》第1卷391);到了宋朝,辛弃疾、柳永等人的词以及程颢、朱熹等人的文章“很多用白话来做的”,可这些白话只是为弥补当时古语的不足,处在“以古语为主而以当时的白话补其不足”的阶段(392);元曲出世,关汉卿、马致远诸人才打破以前的文体,创作时自由地应用当时的北方语言,进入“以当时的白话为主而以古语补其不足”的时期(392);又到明清的《水浒传》《儒林外史》等小说,使很自然的白话文学得以逐步完全成立,这些作品确立的白话语言规则“到了现在还是没有甚么变更”(392—393)。

钱玄同建构的中国白话文学史框架,依据的是“音本位”标准,将“作文接近于说话”的作品挑选出来。这为“五四”白话文提供了历史性的理解与历史的合法性,使唐朝白话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成了“文章即说话”理念的文学支撑,替新文学搜寻到很好的模范,回应了“什么是活文学”的问题。并由此而推出“五四”白话文学并非偶然、刻意现象,而是中国白话文学传统的复兴,为新陈代谢之自然演化。同时,这条历史演变线索也明显是与传统文言文传统争夺“作家”与“作品”,将白居易、柳永、辛弃疾、关汉卿等经典作家的作品强行扭转成白话文学的历史注解,期盼通过这些经典作家的影响力来增强白话文的历史底气。

胡适1921年的《国语文学史》将钱玄同对白话文学历史的设计衍变成更为系统的进化思路:从汉朝的白话文学,到魏晋南北朝的平民文学,又到白话文学发达时期的唐代文学,再到白话词极盛的宋朝文学,继而到白话文学渐趋正统的元朝文学,又到白话文学“成人”时期的明代文学,最后到清朝曹雪芹的《红楼梦》等有著者姓名的白话作品之出现。看到胡适的《国语文学史》后,钱玄同提出白话文学的上限应该从《诗经》讲起,称其中的《国风》是“千真万真的白话诗”,故应大大地表彰“这样很古很美的白话文学”,以让《诗经》“洗一个澡”,并“换上平民的衣服帽子”(《致胡适》;《钱玄同文集》第6卷103—104)。选择让《诗经》作为白话文学的源头,反映出钱玄同富有策略性的一面:一是因为白话文学进化史发生得越早,其现代的合法性越充分;二是《诗经》作为

“六经”之一,是“经国之大典”。钱玄同却将此从“经”扭转为中国白话文学的源头,让新文学的开头有了一个强大的学术凭借,从而巩固了“五四”白话文的历史基础。

胡适接受此建议,并在1922年拟定出相应的计划,可此计划最终未完成。<sup>③</sup>后来,从《诗经》开启的白话文学史脉络,还是由钱玄同公开提出:“中国的白话文学,虽然屡屡被文人学士们踢到阴沟里去,而实际上却是从《三百篇》以来绵延至今,并未中断,不过宋以前的白话文学只有一些诗词,偶然有几篇散文,还不是有意做的,所以没有多大的势力”(《〈世界语名著选〉序》;《钱玄同文集》第2卷70—71);而后元朝出现北曲、南曲“这许多伟大的白话戏剧”,明清时昆剧、京剧等等相继而起,并且明朝产生了《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等几部“伟大的白话小说”,而清朝的《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作“跟着继起”(71);再到“五四”以来鲁迅、胡适、郁达夫诸人“努力地创造许多新的白话文学的作品”(71)。

这条从《诗经》至“五四”新文学演变近两千多年的白话文线索,呈现出白话文学自身的魅力。在钱玄同看来,这些白话作品“绝没有哪个来有意的提倡它们,绝没有哪个来认它们为文学的正宗,只因它们是文学的作品,有文学的价值,便能打动人们对于它们的爱好心”(《〈世界语名著选〉序》;《钱玄同文集》第2卷71)。这些话语以退为进地确立了白话文学史中心观,表明白话文虽未被有意提倡,却始终是历史的主旋律,并绵延了近两千多年,由此可证明白话是文学的正宗,而“文章即说话”理念则具有无可反驳的历史权威性。

(三) 确立白话文的适用范围。“五四”初期,陈独秀等人将“文章即说话”理念的实践范围集中于“文学之文”,认为“文学之作品,与应用文字作用不同”(《答胡适之(文学革命)》;《陈独秀文集》第1卷176),默许新闻社论、法律条文、书信通知等“应用之文”对文言的采用。并且,他们所写的《文学革命论》《文学改良刍议》等倡导白话文的文章,其本身仍是用文言文作的。以“文言”讨论“白话文学”,用“死文字”来提倡“活文学”,让人感到十分别扭。这模糊了白话文的使用范围,易消解“五四”白话文改革的意义。钱玄同察觉到确立白话文适用范围的迫切性,提出只

有当白话文既是“文学之文”亦是“应用之文”之时，“五四”白话文才算获得真正的胜利。他在1917年1月1日的日记中感叹：“往访尹默，与谈应用文字改革之法。余谓文学之文，当世哲人如陈仲甫、胡适二君均倡改良论。[……]而应用文之改革，则二君所未措意。其实应用文之弊，始于韩、柳，至八比之文兴，桐城之派倡，而文章一道遂至混沌。”（《钱玄同日记》296）故他在1917年2月25日致信陈独秀道：

文学之文，用典已为下乘；若普通应用之文，尤须老老实实讲话，务期老妪能解，如有妄用典故，以表象语代事实者，尤为恶劣。[……]弟对于应用之文，以为非做到言文一致地步不可。（《反对用典及其他》；《钱玄同文集》第1卷4—10）

在钱玄同看来，“应用之文”也应遵守“文章即说话”的规则，并且它牵涉的范围更广，它的言文合一比“文学之文”更为重要。对于“文学之文”，“苟有文才，必会说老实话，做白描体”，若无文才，“简直可以不做”；可“无文才者”虽“不必做文学之文”，却“终不能不做应用之文”（《论白话小说》；《钱玄同文集》第1卷44—45）。因此，钱玄同于1917年7月1日又提出应用文改良的十三条大纲，认为应用文使用白话“是根本上之改革”，而“所选之字，皆取最普通常用者”，并“绝对不用典”，以完成“老老实实讲话”的作文原则（《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钱玄同文集》第1卷26—29）。钱玄同关于应用文的改良方案是对胡适等人白话文主张的有力补充，陈独秀对此回答道：“先生所说的应用文改良十三样，弟样样赞成。”（《答钱玄同》13）由此，确立白话文使用范围的必要性才可得以被重视。

钱玄同对应用文的主张使“五四”白话文的内涵与外延得以明晰。“文言就是古代的文学语言，换句话说来说，就是古代的书面语言和人民大众诗歌创作的言，它不仅为文学服务，而且为一般的文牍和政治、历史、哲学、科学等方面的著作服务。”（周祖谟28）故而“白话”要替代“文言”，成为现代的“文学语言”，那它不仅服务于文学本身，也要为政治、历史、科学、哲学等方面的著作服

务，最后普及于各类文体之中，形成用白话写作小说、诗歌、散文、书信、日记、新闻报告、报纸社论、科学论文等文章的习惯，从而真正地确立白话的权威性。只有“白话”被普及，“五四”白话文学才会得到广泛的传播与发展。这也是钱玄同在大家关注“文学之文”时而提倡应用文改革的意义所在。

由上可见，面对“文章即说话”理念在实施时遭遇的困境，钱玄同通过选择“对手”、建构文学史，以及确立白话文的范围等手段进行了突围，弥补了陈独秀等人新文学设计中的缺漏，减轻了“文章即说话”在实践中的阻力，使得“白话文学”这一口号真正成为能说服人心的“旗号”。正如周作人所讲，“五四”初期陈独秀等人对文学革命的意见“还很简单”，直到钱玄同等人参加进去，“‘文学运动’‘白话文学’等等旗帜口号才明显地提了出来”（周作人96）。故而钱基博称赞钱玄同让白话文学“得此强佐，声气腾跃”（钱基博390）。

## 结 语

目前学界多认为，“钱玄同的语言文字革命论属于‘乌托邦的语言观’”（孟庆澍120）。可他的白话文章观，表明钱玄同在“五四”时关于语言文字的设想，并非空论，已成为新文学不可或缺的部分，是推动“五四”文学革命向前发展的关键。钱玄同发挥声韵训诂大家的优势，从文字音韵学中博搜例证，为“文章即说话”提供了学理支撑，并提倡采用复音词、虚词、西式标点，以解决“白话”如何入“文章”的问题，又确立与建构了白话文学的“对手”“历史脉络”“使用范围”，破除了“五四”白话文学的历史困境。这使传统文言文从中国文化的主导地位中退出，在现代文学史以及文化史上的作用是巨大的。由钱玄同的白话文章观，我们可窥出“五四”语言变革与文学革命是同时进行的，二者息息相关，并形成合力，共同促进新文学的发展。故而“语言”并不只是文学史写作中的“点缀”，而应成为现代文学史中的“关键词”与“重要线索”。

钱玄同对语言、文字的极端态度贯彻一生，其白话文章观也有需被后世反思之处：一是语音中心论。钱玄同坚持“语音中心主义”，认为由于大

量同音假借字的存在,中国汉字大多是主音不主形,距离拼音文字只差“猛进一步”(《国语罗马字》;《钱玄同文集》第3卷349),故而可废汉文而彻底采用西方的拼音文字。这抹杀了汉字的丰富性与特殊性。外国语言“无字形”,皆由字母拼音组成,通过朗诵就可表达感情思想,可“汉字除字音还有字形,然后才产生字义”,通过“字形”能“唤起一定视觉,然后引起想象,进入意境”(汪曾祺178)。汉字特有的字形,是汉语言文学美感的重要来源,如予以废除,则中国文学的独创性也随之消失;二是语言工具论。钱玄同主张,“文字同语言,都是表示思想事物的符号”(《罗马字与新青年》;《钱玄同文集》第1卷286),因一时代有一时代的语言工具,所以对于文言文传统“极端驱除,淘汰净尽”(《〈尝试集〉序》;《钱玄同文集》第1卷90)。但不可忽略的是,“语言”并非只是“工具”,其本质上仍是“艺术”,其背后是“有文化的”,如果忽略语言的“艺术性”,“白话文”很容易沦为“大白话”,是“一种没有文化的语言”(汪曾祺435)。

虽然钱玄同的白话文章观存有极端元素,可这些“极端”却为“五四”白话文闯出了一条生路。正如鲁迅所言,“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钱玄同因极端坚持语音中心论而提出“废止汉字”,引起“五四”反对者的注意,故而他们“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卷13—14)。

#### 注释[Notes]

- ① 《钱玄同文集》收录《写白话与用国音》一文时,却将文中的“文章革命”误写成“文学革命”(《钱玄同文集》第1卷372)。这种误写,可略窥出人们在面对“五四”新文学时正无意识地用“文学革命”取代“文章革命”。
- ② 本人另一论文详细地论述了钱玄同“五四”时的“文学革命”对章太炎语言文学资源的借用与转化。请参见王小惠:《章太炎的语言文学观与钱玄同的“五四”文学革命》,《文艺理论研究》5(2020):138—149。
- ③ 胡适在1922年3月拟定了《国语文学史》的新纲目,准备让“二千五百前的白话文学——《国风》”成为单独一章,但此计划未完成。他在《白话文学史》的自序中解释道:“我很抱歉,此书不曾从《三百篇》做起。这是因为我

去年从外国回来,手头没有书籍,不敢做这一段很难做的研究。”(《胡适文集》第8卷135)

####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陈独秀:《致钱玄同》,《新青年》2.6(1917):13。  
 [Chen, Duxiu. “A Letter to Qian Xuandong.” *New Youth* 2.6 (1917): 13.]  
 ——:《陈独秀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 *Collected Essays of Chen Duxiu*.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3.]  
 ——:《答钱玄同》,《新青年》3.5(1917):13。  
 [---. “A Response to Qian Xuandong.” *New Youth* 3.5 (1917): 13.]  
 郭绍虞:《语文通论》。上海:开明书店,1941年。  
 [Guo, Shaoyu. *A General Theory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nghai: Kaiming Bookstore, 1941.]  
 胡适:《胡适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Hu, Shi. *Collected Essays of Hu Shi*.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乐嗣炳编:《国语概论》。北京:中华书局,1936年。  
 [Le, Sibing, ed. *An Introduction to Mandarin Chinese*.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36.]  
 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新青年》3.3(1917):1—13。  
 [Liu, Bannong. “My View of Literature Reform.” *New Youth* 3.3(1917): 1—13.]  
 鲁迅:《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Lu Xun. *The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5.]  
 孟庆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无政府主义与钱玄同的激进主义语言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2005):120—146。  
 [Meng, Qingshu. “Anarchism and Qian Xuandong’s Radical View of Language.”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2(2005): 120—146.]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Qian, Jibo.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1.]  
 钱玄同:《通信:同音字之当改与白话文之经济》,《新青年》6.6(1919):645—648。  
 [Qian, Xuandong. “Correspondences: The Changes to Homonyms and the Simplicity of Vernacular Chinese.” *New Youth* 6.6(1919): 645—648.]  
 ——:《钱玄同文集》(第1—5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 *Collected Essays of Qian Xuandong*. Vol. 1—5.

-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1999.]
- :《钱玄同文集》(第6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 [---. *Collected Essays of Qian Xuantong*. Vol. 6.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0.]
- :《钱玄同日记》,杨天石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 [---. *Diaries of Qian Xuantong*. Ed. Yang Tianshi.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 :《写白话与用国音》,《新青年》6.6(1919): 648—650。
- [---. “Writing Vernacular Chinese and Using Mandarin Pronunciation.” *New Youth* 6.6(1919): 648—650.]
- 王本朝:《白话文运动中的文章观念》,《中国社会科学》7(2013):145—161。
- [Wang, Benchao. “The Idea of Literary Compositions in the Vernacular Movement.”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7(2013): 145—161.]
-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
- [Wang, Zengqi. *The Complete Works of Wang Zengqi*. Vol. 9.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8.]
- 文贵良:《回归与开拓:语言——文学汉语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关键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2008):26—33。
- [Wen, Guiliang. “Return and Development: Literary Chinese as a Keyword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2008): 26—33.]
- 章太炎:《国学概论》,曹聚仁编。上海:上海泰东图书局,1922年。
- [Zhang, Taiyan.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Studies*. Ed. Cao Juren. Shanghai: Shanghai Taidong Bookstore, 1922.]
- :《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 [---. *The Complete Works of Zhang Taiyan: Speeches*.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5.]
- :《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
- [---. *The Complete Works of Zhang Taiyan: Letters*.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7.]
- :《章太炎全集·国故论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
- [---. *The Complete Works of Zhang Taiyan: On National Learning*.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7.]
- 周作人:《周作人散文全集》(第6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
- [Zhou, Zuoren. *The Complete Proses of Zhou Zuoren*. Vol. 6.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21.]
- 朱我农:《通信:革新文学及改良文字》,《新青年》5.2(1918):174—176。
- [Zhu, Wonong. “Correspondences: Revolutionizing Literature and Improving Chinese Characters.” *New Youth* 5.2(1918): 174—176.]
- 朱自清:《朱自清散文全集》(上卷)。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年。
- [Zhu, Ziqing. *Complete Proses of Zhu Ziqing*. Vol. 1. Beijing: China Zhigong Publishing House, 2001.]
- 周祖谟:《从“文学语言”的概念论汉语的雅言、文言、古文等问题》,《文学语言问题讨论集》,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汉语教研室编。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28—42。
- [Zhou, Zumo. “On the Issues of Elegant Chinese, Classical Chinese and Ancient Chinese from the Concept of ‘Literary Language’.” *Collected Discussions on the Issue of Literary Language*. Eds. Division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Department of Chines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Character Reform Press, 1957. 28—42.]

(责任编辑:张均)